

数字货币技术信用逻辑的历史科学分析

——以马克思货币理论为根据

户晓坤

【内容摘要】 随着贸易全球化与跨境支付手段数智化的深度发展，最初作为去中心化竞争性货币的加密数字货币，正向着锚定真实世界资产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试点稳步推进。数字货币变革与资产变革相互交织引起了信用变革，以技术信用界定数字财富形式的一般观念，遮蔽了货币的社会关系本质及其取得不同历史形式的生产方式变革过程。马克思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现实的生关系出发，通过分析借贷资本、信用贸易与货币经营相互结合的分工过程，揭示了货币经营资本的独立化及其技术性业务节约流通费用的中介作用，阐明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与信用制度变革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数字信用的历史科学分析表明，回归共享、便捷与安全的服务本质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 数字货币 货币经营资本 信用 货币数量论

【作者】 户晓坤，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广州 510275)

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去中心化的加密数字货币理念，承载着使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彻底摆脱物质形态、国家权力以及第三方信用等外部性约束，仅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下通过自由竞争获得社会权力的想象。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以及加密数字货币特定职能的普遍化，产生了如何避免币值价格波动、保持相对稳定性的现实需要。在货币运行机制及经营业务上发展出了锚定法定货币、债券、资产或者通过算法控制总量的稳定币，数字货币技术加密性与传统货币币值稳定性之间的相互链接，推动了真实世界资产数字化或代币化(RWA)进程。在全球金融体系重构的加速演进中，各国央行着力推动法定数字货币设计、研发和试点从理论走向现实。央行数字货币(CBDC)作为加密数字货币向国家信用的回归，体现了币值稳定性、支付便捷性、交易安全性、金融包容性、



公共产品普惠性等数字经济发展愿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货币变革发展出了新型数字资产的金字塔层级结构，在观念和交往形式上引发了一系列连锁的数字化资产革命与信用革命，为货币的社会关系本质附着了技术的神秘外观。数字货币技术信用逻辑及其实现方式，提供了透视和反思货币作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棱镜，在不同领域延伸出如何建构货币流通的信用机制、如何界定数字货币与数字资产，以及如何真正在经济活动领域实现代替性的广泛争论。然而真正需要探究的是，在数字货币及其技术体系表象背后，与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相适应的信用基础及其所采取的不同历史形式，澄清数字支付普遍化与货币资本信用化、数字技术资本化以及平台垄断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由此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信用数字化的需求与限制。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为阐明资本主义信用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历史科学的分析路径，同样揭示出只有在新的生产关系条件下，数字化才能真正转化为普惠便捷的新质生产力，将生产力的发展真正归属于社会劳动的力量，而不是资本的权力。

数字货币技术信用逻辑的“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

信息化与全球网络贸易发展使电子支付在制度、形式和技术方面产生了必然需求。如何基于交易安全与市场效率建立各个国家法定货币流通的电子货币系统，成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关键环节。物质形态货币的面对面交易建立在国家中央银行的集中式信任或第三方信用基础上，在互联网与信息技术条件下，电子支付则表现为脱离货币物质基础及其所有权的信息流动与数字变化，这使得电子支付的安全性与唯一性必须依赖作为第三方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来建立共同信任或信用担保。然而，这一现代经济的货币信用体系对于数字资产转移而言却存在管理费用、使用权限、安全性漏洞等“内生性弱点”。作为数字货币基础的比特币设计理念正是出于电子支付普遍化条件下对传统货币集中式信任的不信任。不但要求彻底摆脱法定货币的物质实体，而且将“数字”本身作为流通“货币”，完全基于密码学原理以及算法的纯粹技术体系取代中央银行、金融机构等第三方信用体制，建立点对点的数字资产转移方式。由此，能够为比特币的去中心化提供支撑的区块链技术，便在货币数字化的交易安全以及技术操作层面获得了充分开发。这意味着，在去除传统货币通过第三方建立信用的前提下，电子支付如何建构人们对于数字货币及其流通、交易的社会信用问题，被置换为可以脱离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往方式、纯粹通过数字技术与自由竞争机制实现的可计算性问题。比特币白皮书正是基于上述原理发出了实现货币革命、重构交易信用的宣言。

基于对集中式信任的替代性理念，去中介化的区块链技术的革命意义被称为“中本聪们送给世界的礼物”，即“建立一个分布式的、由集体维护并验证的数据存储结构，使人们对其所含信息的时序性、统一性及不可更改性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①这一分布式账本技术使得在互联网上建立可计算、可控制的非人格化“点对点信任”，即通过区块链记录、存储和验证数字货币所有权及其交易信息记录，通过分布式节点的共识算法生成和更新数据，通过密码学保障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性。上述技术组合使区块链具有了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以追溯且公开透明的“技术信用”特质。当“不需要信任的信任”通过数学与编程的加密逻辑在货币与劳动的数字化、可计算性上获得了实现的基础技术架构，并且成为互联网移动电子支付的基本共识和计算范式时，区块链应用技术就已经超出了加密数字货币本身包含的内容和需要，激活了人们颠覆传统货币观

① 王薇：《信任革命：比特币及去中心化数字货币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7页。

① 赵刚、张健：
《数字化信任：区
块链的本质与应
用》，北京：电子
工业出版社，2020
年，第4页。

② 埃斯瓦尔·S.
普拉萨德：《金钱
的未来：数字革
命如何改变货币
和金融》，张义译，
北京：中译出版
社，2022年，第
129页。

③④ 比尔·莫勒
主编，泰勒·C.内
尔姆斯、大卫·佩
德森编：《货币文
化史VI：现代数
字革命与货币的
未来》，陈佳铨译，
上海：文汇出版
社，2022年，第
63页，第7页。

念、挑战货币政策与发行的国家法定权力以及应对通胀或紧缩不确定性的想象力。2013年，在第一代比特币区块链中引入了通过自动化脚本执行数字货币流通与交易数据记录的智能合约。“以太坊区块链为加密数字资产提供了图灵完备的通用平台，催生了很多基于以太坊的加密数字代币和去中心化应用”，^①区块链技术不断溢出加密数字货币，拓展到加密数字资产等众多领域。在数字时代货币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双重推进下，比特币从技术白皮书的概念创新发展为由“区块链”底层技术、发行与运作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数字资产以及围绕其展开的新经济体系相互结合与嵌入的层级整体。

区块链程序和算法为消除附着于货币的约束性条件，建立在表现形式上更为中性化、更少受到道德政策和法律等不确定因素干扰的信用机制与交易秩序提供了技术上的现实性。数字货币的技术体系表现出脱离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及其交往形式的独立性外观。“比特币背后的逻辑是一种形式的共识，即网络上的所有参与者形成共识，可取代信任”，^②即通过密码学和程序算法建立比国家制度、政策、法律更加透明和可以预测的货币信用背书机制。比特币作为技术宣言的提出，正值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的标志性节点。长久以来，金融资本全球扩张与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引起了人们对于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超发的不信任，以及对替代货币与资本需求的增长。至今，比特币作为价值尺度、交换媒介、贮藏手段、投机资产，经历多次暴涨、下跌、反弹和暴跌，其在货币的技术形态以及技术的货币形态上引起的冲击，远远超出了加密数字货币本身是否能够成为国家法定货币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争议。

相对于传统货币观念及其政治立场、经济社会运行基础而言，区块链去中心化的“技术信用”逻辑所传达的“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更具挑战性。因为货币的技术形式无疑需要附着于人们的普遍共识与共同信念才能发挥作用。“印刷技术改变和削弱了中世纪行会的权力和社会权力结构，和它一样，密码学也将从根本上改变公司和政府对于经济交易干预的性质。”^③加密数字货币在一定范围内的影响力与颠覆性，使20世纪以来关于货币职能与存在形式、货币定价以及可交换性的限度、国际货币体系与货币发行政策及其所依赖的现代性观念、经济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动摇。当前，商品货币、法定货币以及信用货币获得普遍性的现实依据以及相关理论，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加密数字货币的技术形态变革与经济社会形态演进之间的内在关联。

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在人类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所取得的物质形态以及货币发行、流通、分配所依循的合法性基础与信用逻辑，总是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相适应。从简单商品交换中发展起来的、以交换价值增殖为目的的商业贸易，在传统社会解体与现代资本主义形成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货币削弱了传统的（特别是本土或封建的）社团形式的社会地位和依附关系，促进了个人自由的发展，使人们与事物以及他人疏远开来。人们认为，是货币推动了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从地方社会到全球社会的转变。”^④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与流通手段，不仅扩大了陌生人之间进行自由交易的时空范围、奠定了信任基础，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与现代秩序建立提供了现实手段。对法定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塑造并强化了现代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干预和管理能力，建构了各个国家、区域之间以普遍交往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与国际货币体系。16—18世纪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通过海外殖民贸易积累起了大量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将真正的财富建立在那些作为特殊商品的贵金属中，商业资本主义对于交换价值增殖的追求不但使商品与货币关系普遍化，而且为产业资本的崛起创造了必要的物质生产条件及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

由此，关于货币的本质起源、价值规定以及流通与交换的信用机制成为各种经济理论必须确立的前提性规定。从古典主义经济学开始，货币便与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建立起必然联系，并且在经济学上形成了货币中性论抑或货币非中性论、货币取决于自发的市场秩序还是国家权力的争论，表现为商品货币理论、国家货币理论等不同的立场主张。商品货币理论将货币的信用基础建立在商品本身的属性及内在价值之中，货币被视为基于个体理性选择用于降低交易成本、通过自发的市场秩序实现商品交换的“中性工具”，货币本身的流通（量）便与商品交换的实体经济（质）之间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二分体系。然而，仅仅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与价值尺度的商品货币理论及其货币数量论观念，无法解释 19 世纪以来货币为何越来越脱离物质形态、向信用货币发展，以及政府和银行如何通过发行债券、贷款、股票等，将货币信用渗透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不同阶段和各个环节之中。虽然加密数字货币在稀缺性及竞争性方面尝试模仿贵金属等商品货币的特征，但其信用基础显然并不基于对象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一定比例关系。

在货币的起源与社会合法性根据问题上，与商品货币理论相对的国家货币理论主张，国家权力是货币发行、流通和交换的关键因素，货币的合法性基础及其市场需求来自国家权威。然而，正如马克思·韦伯所批评的，货币效用及其被接受的普遍原因，不仅需要国家法律在“形式有效性”上所赋予的货币秩序，而且需要来自普遍信任的“实质有效性”，即作为法定货币能够在一定时期保持自身交换价值或购买力的稳定性，以及公众对于货币信用和国家权力的普遍共识。然而，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的全球扩张，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债务和信用关系已经成为货币的本质所在，在资本主义金融体系以及私有产权关系高度发展的信用货币体系中，银行与各种金融机构发放的存款证明、贷款合同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延伸，成为资本流通过程的主要交换媒介。信用货币正是基于具体的债务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发行货币的职能，相对于商品货币、国家法定货币，越来越成为主要的货币形式和支付手段。国家权力对于货币发行的垄断以及债务关系对于货币需求的扩张，尤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并经历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引起了人们对于以国家法定货币为基础的纸币以及其他代币如何保持自身价值稳定性的困惑与恐慌。

当一般货币理论无法对加密数字货币的合法性机制做出解释时，哈耶克关于货币非国家化的制度设计却在货币的数字化趋势中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货币的非国家化”“让货币摆脱政治”的多元货币理念，正是基于哈耶克对国家货币控制权发展为极端的深切忧虑，因此他提出了通过私人发行货币的自由竞争机制克服政府垄断权力滥用的设想，“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政府不可能使纸币不贬值，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理由怀疑，人们在技术上做不到控制符号货币的发行数量，以使其价值得到准确的体现”。^①在哈耶克看来，那些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货币的币值基本上是稳定的，从而能够防止投资的过分扩张，以及可能出现的经济收缩。在无法对国家垄断性控制货币的制度进行修补的前提下，只能回到贵金属本位或者建立私人发行货币的竞争性机制。“竞争肯定会被证明是一种比以这些商品（或黄金）赎回这些钞票的义务更有效的约束，它会迫使发钞机构保持其货币的价值稳定……”^②加密技术使数字货币表现出多重化、复杂性的神秘外观，以比特币为基础延伸出了稳定币、央行数字货币等一系列发展的形式，在观念形态上尝试克服传统货币的缺陷，使数字货币成为摆脱贵金属的货币商品、摆脱国家权力的法定货币、摆脱债务关系的信用货币，通过程序和算法模拟贵金属生产方式所形成的币值稳定性建立“不需要信任的信任”，货币流通与支付的技术性变革使哈耶克所欲的、能够对抗国家垄断权力的竞争性货币具备了转化为现实的条件。

①②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对多元货币理论与实践的分析》，姚中秋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9 年，第 14 页，第 39—40 页。

“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数量论前提性批判的“历史的现实基础”

综上所述，当信息和算法技术的充分发展使货币流通的数字化与可计算性脱离现实的物质形态，达成“点对点信任”或数字化信任的普遍共识时，货币便在数字形态上取得了自身最理想、最纯粹的形式。然而，界定数字货币所有权并将承载着交易记录的各个区块依次链接起来的历史的现实基础，并不是在封闭的技术系统内部实现的。如果说区块链技术是加密数字货币建立交易与流通安全性的信用逻辑，那么各个区块之间实现链接的竞争性机制，从根本上则取决于货币作为社会关系的物化本质。“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像的东西。”^①加密数字货币不仅将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换关系抽象化为纯粹的技术逻辑，而且使货币作为经济范畴所表征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也隐而不彰。这一试图解决“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在货币价值规定上本质性矛盾的设想，在根本上源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完全放任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的稳固信念、技术中立主义态度以及货币数量论前提。如果仅仅在表现形式上将加密数字货币归结为货币革命或技术革命，必然陷入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还原论立场。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分析要求，根据经济社会形态变革与技术社会形态变革的相互作用，揭示货币数字化的现实条件及其发展过程，把握与一定货币形式相适应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变革的根本性质。

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批判重商主义的货币拜物教，并将劳动确立为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从而使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取得了它的理论表现与历史进步性，那么，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数字货币加密技术，则为货币拜物教附加了算法的神秘性外观。呈现出货币的价值形式与社会劳动或财富的社会性质相脱离的物化表象。由于货币在资本主义流通中具有无处不在的多重职能，通过货币改革建构更加公平的经济体系，成为长久以来盘亘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稳固信念。数字货币加密技术所确立的“无政府主义宣言”，在货币数量论的前提规定上与英国的李嘉图社会主义者、法国的普鲁东主义者表现出了惊人的历史相似性，即混淆了生产的物质技术过程与支配这一过程的特定的社会形式，不是从社会生产关系或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来把握货币范畴的物质形态或技术方式，必然导致以技术的中立性遮蔽货币形式当中的权力关系，这是由于“在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的货币关系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派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多地求助于这种简单的货币关系，来为现存的经济关系辩护”。^②

为了科学地叙述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入剖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以及国际金银流动理论，将上述情形归结为一个问题，即“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要问的是：如果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③马克思进一步揭示“货币的产生与本质、货币的流通与职能”，将研究视域从商品交换与货币流通转向了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转向了构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生产关系总体。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作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问题本身的荒谬只能通过对问题本身的批判与否定来解决，只有澄清古典经济学以及接受其理论前提的各种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在货币范畴以及物质形态上的自然化立场与形而上学观念，才能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何使商品生产与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50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95页，第69页。

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出现“着了魔的颠倒”，从而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历史的现实基础提供必要的理论前提。

为了正确地提出货币范畴的社会规定性问题,马克思将批判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作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的开端,从危机的货币化表现揭示货币的起源与本质,构成了向“资本章”过渡的关键环节。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扬弃了货币的金银形式,但在货币数量论的前提下,只能将发达形式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视为以自然需要为基础的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将商品交换仅仅视为产品交换,因而无法实现货币概念向资本概念的跃迁,同样无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深入考察各种经济关系的历史的现实基础。正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混淆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与货币作为资本增殖手段的本质区别,他们才无从发现,以交换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生产关系建立在资本对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占有(剩余价值的生产)基础上。就此而言,达里蒙的货币改革方案完全是普鲁东主义立场的。普鲁东将工人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价值难以在市场上体现,为了实现以“工资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方案,他主张使货币体系摆脱金银的限制,依托工人实际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劳动价值与设定劳动力价格。在马克思看来,普鲁东混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作为价值决定基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实际劳动时间的本质区别,试图通过经济范畴在逻辑关系上的一致性来消除产生社会不平等的历史的现实基础。而达里蒙进一步将为了获得使用价值的货币流通需要,与为了获得货币资本的信贷需求完全等同起来,试图通过货币制度改革或建立新的分配形式,用“劳动货币”(直接消耗在商品上的劳动时间)取代间接表现商品价值的金银,将商品转化为货币的困难性从普遍的交换关系中排除,以此改变不平衡的分配关系以及工人阶级消费不足的问题。马克思批判达里蒙对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货币与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一无所知,如果不能在根本上消灭在货币范畴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本身,就不能真正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的弊病不是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①

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科学确切性”建立在对货币数量论的前提性批判之中。历史科学分析在货币理论中的贯彻,“使作者不把经济规律看做永恒的真理,而仅仅看做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②即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为了真正提出货币问题,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基于一定的生产方式考察货币的起源本质、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银行的货币发行及其信用基础,并且以历史科学的方式回答,随着资本流通的普遍化和扩大化,货币那些可被利用的属性在特定条件下获得了必要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贵金属、基于国家权力发行的纸币、银行贴现等信用货币以及普鲁东观念中的劳动货币,构成了货币范畴的不同文明形式,只是由于这种或那种货币形式能够更方便、更合适、更少困难地适应于社会生产的不同阶段。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只是由于一种货币形式可以在资本流通过程中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③在以普遍的劳动分工与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为了克服商品在流通过程中买与卖的分离,内在于商品中的交换价值在货币形式上取得了自身的独立性,作为一般商品或交换能力的货币便与其他特殊商品或特殊交换能力相对立。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资本流通取得了支配性,为了消费使用价值而进行的商品交换与为了交换价值增殖而进行的商品交换的二重化不断扩大,货币的社会权力便作为商品交换普遍化和扩大化的矛盾表现,作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

①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82页,第69—7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34页。



①②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99页，第96页，第10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3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17页。

商品生产发展起来。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货币的特点正在于通过否定自身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货币所以能够克服物物交换中包含的困难，只是由于它使这种困难一般化，普遍化了”。^①这意味着，仅仅通过货币形式的改变，不能消除货币代表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特有的社会形式及其内在的矛盾，反倒是在以商品的普遍交换为目的的社会条件下，必须通过货币形式的独立化来克服买与卖之间的彼此分离。只要生产的目的是追求交换价值的增殖而不是满足社会需要，货币不足或货币过剩便会始终作为商品生产关系固有矛盾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货币没有造成这些对立和矛盾；而是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②

如果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当中，马克思通过对普鲁东主义货币改革方案的批判，使货币问题在资本流通的前提下被正确地提示出来，那么《资本论》中的“货币转化为资本”则为解决货币数量论所造成的各种理论混乱、揭示货币先验权力的历史本质建立了“合理的抽象”或现实的出发点，以科学确切性阐明“在商品的概念中货币如何已经作为自在地存在的东西被表述出来”。^③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叙述方式中，货币不但被视为在物质形态上与商品本身相脱离的、作为商品交换价值的社会形式，而且货币形式向资本形式过渡的物质生产条件同样被建立起来。马克思在第一篇“商品与货币”中，通过阐述商品二重性、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一般价值形式在货币形式上的独立化，指出正是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以及交换关系的普遍发展，为货币形式的结晶提供了必要条件。然而，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绝不意味着具备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在第二篇中，马克思通过“货币转化为资本”建立起“劳动”与“劳动力”范畴的本质区分，真正从商品交换、货币流通进入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关系起源于劳动力转变为可用货币购得的商品的现实历史运动，以及由于这一运动所必然导致的货币资本化，即货币资本以预付资本的形式在现实资本的实际运动中回到自身，即G—W—G'运动形式所建立的自我同一性。就此而言，“货币转化为资本”作为既定的社会现实，是以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为根据的，“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④

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高度评价了这一环节的关键性作用：“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一章和剩余价值的产生的一章，就叙述和内容来说，是迄今为止最光辉的两章。”^⑤当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资本扬弃货币的价值形式，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生产资料便取得了对于剩余劳动的合法占有权和强制权，劳动的一般社会形式在货币上表现为物的属性。马克思指出，一切产品和活动都转化为交换价值，一切产品和活动的普遍交换构成了个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以生产中一切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全面解体以及生产者相互之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的。每个个人的生产与消费的相互需要与全面依赖，构成了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表现在不断进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表现为货币在交换价值上取得自己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必要性，“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⑥货币权力是随着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发展起来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转化为物的社会联系，财富的社会性质表现为私人货币的先验权力。这种社会联系的本质是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统治，这样的支配和统治关系在整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交往形式中发挥着决定性和支配性作用。

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与信用制度变革的历史科学分析

如果仅仅滞留于货币范畴在量上的抽象形式，而不是作为社会关系在价值形式上的本质规定，不仅无法区分具有增殖职能的货币资本与具有交换职能的货币流通，同样无法区分商品货币与信用货币。马克思就此指出，古典经济学将金银等贵金属视为对资本事实上最无关紧要和最无用的形式，“一旦它讨论到银行制度，一切就倒转过来了，金和银成了真正的资本；为了维持这个资本，必须牺牲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①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的现实基础”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同发展起来的是对不断扩大的信用货币的需要，货币的信用化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直接产生的，“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是价值符号的完成形式，是直接从金属流通或简单商品流通本身中产生出来的纸币的唯一形式。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它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②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一方面在观念上作为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真正实施支付时，货币不再是流通手段或物质变换的媒介形式，而是作为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相互对立，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实际发挥作用。随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发展，为克服货币在观念上与真正支付中的内在矛盾，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发展出了信用货币。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对货币资本的现实需要推动了货币的信用化。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货币资本形态具有商品的特殊性质，它不但分离出作为中介的、纯粹形式上的货币经营的技术性业务，使货币流通更加集中、缩短和简化，而且使货币资本在商品规定性上潜在包含的、特有的贷放形式或借贷形式现实地发展起来。

马克思强调，不能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把握为特殊种类的资本，而应当视为资本价值形式转变的不同状态，或者资本价值运动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职能形式，执行特定职能的资本在循环过程中通过采取或抛弃这些形式实现自身的价值运动，回到最初的形式后重新进入新的循环过程。因此，使资本价值形式的循环过程或者形态变化在扩大再生产的不同阶段上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就成为必要的了，为了加速循环过程、克服流通障碍而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率的剩余价值，承担货币职能、生产职能或商品职能的资本家必然需要通过借贷关系获得作为准备金的货币资本，信用表现为在货币市场上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货币资本家或从事货币经营的组织让渡了货币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结晶的货币本身成为特殊商品，获得了自身的独特使用价值。“由单纯的周转运动这一机制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还有由固定资本依次流回而形成的货币资本，以及在每个劳动过程中可变资本所需的货币资本），只要信用制度发展起来，必然会起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必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一”。^③马克思指出，借贷关系、发达的信用、银行制度并非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原因，而是扩大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充分发展的结果。在汇票贴现与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为集中和积聚更多作为准备金的货币资本，银行信用随之发展起来。这恰恰是以达里蒙为代表的货币改革方案无从触及的、货币资本在实际运动中向着借贷形式的生息资本转变的必然趋势。信用制度、信用机构及其所创造的信用工具（信用货币）的自然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化和普遍化。资本主义生产不仅需要竞争使利润平均化，而且需要信用对于利润平均化发挥中介作用，信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同样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因此必须联系产业资本与生息资本来考察信用基础的建立及其采取的不同历史形式。

马克思分析了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两种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历史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商业信用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循环与周转，职能资本家之间的相互预付构成了信用的真正基础。货币商品化所形成的借贷关系与普通的商品交换不同，在借贷关系中不会发生货币形式与商品形式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64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1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3页。



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390页，第546页，第389—390页，第449页。

价值形式变化。贷款人将货币出让一定时间，借款人将货币作为商品接受下来，经过一段时间将借入的货币作为已实现的资本（即包含着表现为利息的剩余价值）偿还给所有者。贷款人获得的利息作为已经实现了的利润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把货币放出即贷出一定时期，然后把它连同利息（剩余价值）一起收回，是生息资本本身所具有的运动的的全部形式。贷出的货币作为资本所进行的现实运动，是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交易以外的事情”。^①贷出的处于再生产过程一定阶段的货币资本用于补偿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因此，信用的扩展和收缩与生产的扩大与收缩同步，“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②商业信用作为资本主义信用的基础，是为了保持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连续性而从货币资本的支付职能中派生出来。

银行信用则在资本积累的规模、期限和范围上实质性地超出了商业信用的边界，通过更大规模的货币资本的集中和积聚，不断将商业信用所依赖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弹性强化到极致。银行资本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即通过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将分散的货币资本集中起来与职能资本家形成借贷关系。银行信用的独立化不再像商业信用那样与资本主义再生产规模保持一定关联。在银行信用发展的基础上，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在作为生息资本派生形式上完成了。“一般资本的具有特征的运动，即货币流回到资本家手中，资本流回到它的起点，在生息资本的场合，取得了一个完全表面的和现实运动相分离的形态。”^③生息资本在G—G'的回流形式中呈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外观，仅表现为资本所有者之间法律交易的结果。在放出与偿还之间的一切运动形式与中介环节都消失了，货币资本作为商品进入再生产过程的价值形式转变以及利息作为从利润中分割出来的剩余价值来源被掩盖起来了。

生息资本的独特性质在于使货币成为一种商品，表现为不借助起中介作用的、商品与货币相交换的中间运动就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如果剩余价值在利息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上来理解，那么，界限就只是量的界限，并且会超出任何想象”。^④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在借贷关系中表现为与剩余劳动的实质性关系相脱离，资本积累不断突破总工作日、生产力等质的界限。在基于借贷关系的生息资本形式上，货币作为积累起来的、过去的死劳动具有了支配现在的活劳动，并按照几何级数生产剩余价值的的能力。然而，积累起来的死劳动对于活劳动的占有和支配方式，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或者说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上才能够实现。生息资本一旦获得独立性和自主性，便按照自己的方式通过利润平均化运动影响总体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取得普遍形式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是信用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而建立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基础上的信用机构以及信用工具所取得的新的形式，一方面对于减少流通费用、加快流通在各个阶段上商品形态与资本形态变化、促进股份制的发展发挥着中介作用，另一方面又作为生产过剩与商业过度投资的杠杆，不断压缩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弹性空间，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与世界市场扩张的同时，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

与货币的信用化一并发展起来的货币经营业，即经营货币商品的商业，最初表现为国际贸易中的兑换业与金银贸易，产生于货币作为一国铸币与世界货币的双重职能。当资本的借贷职能、信用贸易与货币经营业的其他职能结合在一起，货币经营业会获得更为充分的发展。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技术性业务是从货币、货币资本的特殊职能中获得自身内容、建立自身活动方式的。在信用制度下，货币经营资本的专门化是为了适应生息资本对货币资本贮藏职能与支付职能在纯粹技术方面的需要，即将贮藏货币不断分解为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使其重新回到贮藏货币。

“这种单纯技术性的收付货币业务，本身就构成劳动，它在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时候，在“差额被计算出以后，使结算的行为成为必要。这种劳动是一种流通过用”。^①当这种特殊的劳动从单个职能资本中分离出来，由特殊代理人或经营机构代替整个资本家阶级承担起来，在缩短单个职能资本家劳动的同时，产生了特殊的劳动和费用，即流通过用。在马克思看来，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节约流通过用的需要，货币经营业务独立化并对货币流通发挥中介作用，即缩短买和卖、加速资本形态转变、建立各种形式的借贷关系、开发信用手段等。这种为整个资本家阶级服务的货币经营业务作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会不断集中并以更大规模进行。在这一特殊经营领域内部也会不断产生更为专业化的分工，形成相对独立的部门，并在这些部门内部形成专门设施。这些专业化部门和专门设施不断脱离职能资本，发展成在表现形式上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对独立的领域，“货币的收付、差额的平衡、往来账的登记、货币的保管等等，已经同使这些技术性的业务成为必要的那些行为分开，从而使预付在这些职能上的资本成为货币经营资本”。^②从节约流通过用、加速资本周转以及为保证再生产连续性所必要的货币准备金的服务性目的来看，这些在技术上对货币流通发挥中介作用的货币资本，因作为预付和追加的资本而具有了G—G'的一般资本形式，作为货币流通的技术要素而从剩余价值中分割一定的份额。

随着20世纪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独立化与专门性的货币经营业在国际分工与生产全球化、国际贸易以及国际金融领域发挥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越来越成为维持资本价值运动连续性的关键环节，货币经营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分割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裂隙不断扩大。流通过用的节约对于促进资本流通与加速资本周转而言，有赖于数字化要素在货币经营领域中的广泛运用以及对传统货币职能的深度替代，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为数据生产和传输提供了现实条件，通过建立安全、便利、有弹性的数字支付系统，克服流通过程中的一系列物理障碍，从而推进了货币的数字化与数字资产的资本化的双向建构过程。货币经营资本独立化与数字化是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过程。如果说产业革命以来，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充分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银行账户体系，信息革命则使货币经营资本的数字化成为可能，即在银行账户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交易主体“账户化”实现“数字化运行”，不仅公司与企业之间的支付体系、流通体系通过“账户化”实现了“数字化运行”，而且更为普遍化地建立了交易合同化的个人数字账户体系。银行货币与银行账户系统是产业革命背景下国家、政府与职能资本通过信用的中介实现资本扩张的基础。“以工矿业为代表的产业革命要求彻底摆脱铸币的约束，以更庞大、更充沛的货币资本支持产业革命，这直接导致了商法革命和中央银行革命。”^③从数字货币与个人账户体系中发展出来的数字信用，通过加密技术实现并保障货币资本经营的安全性、私密性以及便捷性，使建立点对点的信任成为可能，进一步克服物理意义上的流通障碍与银行账户体系的局限性，形成数字支付对于银行支付的替代。

由于作为支付手段的数字货币具有货币的经济属质与数字的技术属质，在独立的技术信用外观下，它还表现出作为数字资产的资本化潜力。数字货币与个人账户体系对于流通过用的节约，进一步推动了货币经营业内部的专门化分工与专业机构、技术性应用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数字支付体系的技术投资、数字资产代币化以及金融化，正加速形成数字资产的金字塔层级体系。由于全球化生产与跨境贸易数字化需要的不断扩大，区块链技术、数字化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政策以及金融机构支持体系、社会财富观念形态的不断发展，为真实世界资产的数字化或代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353页。

③周子衡：《变轨：数字经济及其货币演进》，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年，第56页。



币化提供了充沛的现实条件，在加密数字货币体系中发展出锚定真实世界资产的稳定币形式，稳定币运行机制不仅仅意味着在资产数字化与数字货币币值稳定性之间建立深度链接的尝试，而且表现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实现深度链接与灵活转化的发展趋势，回归国家信用的央行数字货币试点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最初的“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货币与资产数字化是技术变革与经济变革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推动下货币经营资本独立化的结果。如果说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化，是由于分工的专门化与生产者对于普遍交换形式的依赖，从货币的支付职能中发展起来的数字货币，则建立在生产社会化以及生产者之间全面依赖关系所产生的信用基础上。或言之，数字信用只能建立在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数字化的货币革命与资产革命在实质上表明，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信用体系以及交往形式是在人们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社会联系与深度的分工合作，构成了数字货币、数字资产等各种数字经济要素获得实际发展的历史的现实基础。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货币“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4页。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阐明了像货币这样属于一定时代的经济范畴所具有的历史性质。历史科学不仅要求在生产方式变革的前提下，揭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的现实基础，而且要求历史地分析由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发展，在资本流通更加普遍化的条件下，货币的各种职能获得了哪些可以被发现、拓展并且增强的性质；为了充分释放货币资本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哪些社会分工、组织方式以及技术要素会被进一步结合于资本价值运动过程之中；流通费用的节约在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如何使货币经营资本支配的金融化不断脱离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实体经济领域，陷入周期性危机。只有在观念上克服货币数量论的形而上学立场，把握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货币的社会关系本质及其颠倒的物化表象，才能进一步揭示物化表象背后货币信用的资本逻辑及其数字化发展趋势，从根本上阐明，程序和算法所建立的分布式信任不能代替或取消商业信用、银行信用以及国家信用体系。只有在社会化生产的程度和水平获得了高度发展的信用体系中，货币的支付职能才能取得更为纯粹和抽象的数字形态，以更高的安全性、灵活性和便捷性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与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建立点对点的信任。历史科学分析要求在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中揭示资本主义信用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其危机解体过程，当数字货币发展为商品形式的数字资产，数字资本生产形式的扩张必然走向集中与垄断，数字化变革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由于这种生产关系造成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深度分裂。“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②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为目标的高质量普惠金融体系已经基本建成，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的有机结合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普惠”构成了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在激发数字经济活力的同时，旨在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表明，只有在与一定阶段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条件下，才能真正使货币的数字化变革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实现资源配置高效率与宏观调控高效能，回归数字化金融共享、便捷与安全中介作用或服务本质，使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数字信用不断向个体下沉而成为真正的社会信用。

②《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514页。

编辑 张蕾